

# 百年变迁视野下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

黄家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6)

**[摘要]** 站在百年变迁的历史视野来看,由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是一场应对我国近代乡村社会现代性危机的巨大实验,蕴含着明确的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追求。通过“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解决农民的愚、贫、弱、私“四大疾病”、培育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是定县实验的基本方针。定县实验在历史上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同时也伴随着各种争议。定县的平民教育模式、知识分子与乡村相结合的传统、乡村保健卫生制度和定县精神,是定县实验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对于今天的乡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晏阳初; 定县实验; 平民教育; 文化自觉; 定县模式

**[中图分类号]** C9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 [2020]12-0039-07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0.12.006

一百年前的1920年,晏阳初先生学成回国。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他开始探索通过开展平民教育来实现国家改造的道路,定县实验是其探索的集大成者。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快速而剧烈的历史性变迁,当下仍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sup>①</sup>。站在百年变迁的历史视野下回望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氏所主持的定县实验,对于认识近代以来我国乡村建设的历史脉络、历史贡献,以及其对于当前乡村建设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危机与“定县方案”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之际,中华民族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有识之士纷纷寻求危机解决的方案。其中,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看到了乡村的价值,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乡村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基础。他们不仅从理论上对乡村危机和乡村重建进行研究,而且还深入乡村、躬亲实践,数十年如一日,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投身于乡村建设,积极探索乡村发展之路。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华大地兴起了颇具声势的乡村建设运动。据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至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和机构达600多个,在各地设立的实验区超过1000处<sup>②</sup>。在众多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是最具特色、最为系统,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实践之一。

### (一) 民族自觉、文化自觉与乡村建设

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家,在社会危机的大症候之下,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凋敝、社会失序、文化失调、政治混乱的整体性危机之中<sup>③</sup>。从长时段的文明转型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这场危机实际上是一场传统农业文明在面临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冲击下所发生的现代性危机。而外国军事、资本力量的入侵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又使得这场现代性危机变得更加深重和复杂。

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正是应对这场复杂危机的实践探索,而在这一实验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乡村建设理论正是应对这一危机的“定县方案”。无疑,晏阳初的定县实验虽然是对乡村进行改造,

收稿日期:2020-11-10

作者简介:黄家亮(1980—),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城乡社区治理。

基金项目: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定县追调查”项目和“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河北定县农村百年演变的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5XNLG04)的支持。

①韩俊《从江村看中国乡村的变迁与振兴》,《经济日报》2018年6月5日。

②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页。

③参见渠桂萍《现代化的压力与乡村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一个分析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王先明《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

但视野并非局限于乡村,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目标,那就是因应这场危机,通过对乡村的改造而实现民族和文化的复兴。晏阳初在梳理自己乡村建设历程的时候,曾明确强调他的乡村思想“完全由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sup>①</sup>。

晏氏所谓的民族自觉,是指“自力更生的觉悟”。他认为,帝国主义或帝国资本主义确实是导致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在民族自身没有力量之前,一切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或帝国资本主义曾经狂热一时的目标,都变成了腩子泡样的空虚口号,一切的一切都是废话”<sup>②</sup>。要应对这种危机,只能反求诸己,在自己身上想办法,而乡村建设正是一个突破口。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而他们的生活基础是乡村,“民族的基本力量都蕴藏在这大多数人——农民——的身上,所以要谋自力更生必须在农民身上想办法”<sup>③</sup>。在另一篇总结性文章中,他还明确提出“中国的农村运动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据我们很清楚地看来,它耸着巨大的铁肩,担着‘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sup>④</sup>

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来看,对于晏阳初来说,乡村建设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一种手段。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接触后,感到事事都不如人,同时国内的社会秩序、政治制度、礼俗习惯,所有一切的生活方式都发生变化。固有文化既失去其统裁力,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未能建立起来,因而形成文化的青黄不接。思想上更呈混乱纷歧的状态。他认为,要解决这种文化失调的现象,“只有从根本上求创新(Creative Adaptation)的必要”,“这样就想到‘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而中国的‘人’的基础是农民,其生活的基础在乡村,所以结果也就逼上乡建的一条路。”<sup>⑤</sup>

## (二) 拯救乡村的“定县方案”

定县实验是晏阳初乡村建设事业的经典和高峰,实验的过程也是其乡村建设理论逐渐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定县实验有着明确的问题导向,其方案是建立在他对乡村危机进行科学“诊断”的基础之上的。

晏氏认为,无论是民族的自觉还是文化的自觉,都要从“人”的因素入手。他认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较任何问题都严重;它的根本性,也比任何问题还根本。”<sup>④</sup>而早在他留学期间,他从一战战场上的华工身上看到了普通农民身上所蕴藏的惊人的“伟力”,只要把这些力量开发出来,就可以使农民变为“新民”。因此,他在1920年留美回国后即组织开展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与陶行知等人在京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并担任总干事。1926年平教会在定县翟城村开始平民教育实验,并于1929年将实验区扩大到整个定县,随后平教会总部也由北平迁往定县。该实验持续十年之久,只到1936年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入侵才被迫中断。这就是著名的“定县实验”。

晏阳初认识到,中国伟大的力量是农民,这种伟大的基础和潜伏的力量,还没有开发,而“要培养农民自己的自发的力量,惟一的途径就是办教育,否则是表面的粉饰的不能生根的”<sup>⑦</sup>。定县实验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开发农民“脑矿”,激发农民潜力,以启民智、图国强。如何开发农民的“脑矿”呢?定县实验的参与者们首先是从深入的实地调查,寻找农民的真正需求开始的。在冯锐和李景汉两位学者的先后主持下,平教会对定县社会进行详细调查,内容涉及人口、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农业、工商业等各个方面。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平教会同仁逐渐认识到,困扰农民的主要问题为“愚、贫、弱、私”四大问题,他称之为“四大疾病”。针对这“四大疾病”,他们鲜明提出“扫除文盲、再造新民”的口号作为定县实验的纲领,并提出要相应地开展“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贫、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由此培养出有知识力、有强健力、有生产力、有团结力的“四有新民”<sup>⑧</sup>。晏阳初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乡村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在乡村建设实验中,应该统盘筹划,而不能停留于枝枝节节。他将四大任务视为既具有并列关系的小系统,又是相互间有一定因果或逻辑联系的立体网络,因此解决乡村社会的

<sup>①②③⑤</sup>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载《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79-91页。原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sup>④⑥</sup>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载《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263页。原载《民间》第一卷第十期,1934年10月10日。

<sup>⑦</sup>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简史》,载《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

<sup>⑧</sup>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载《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53-62页。

问题既要注意四大任务进行过程的连续性,又要照顾到它们之间的必要逻辑联系。<sup>①</sup>因此,“四大教育”的开展遵循“连环进行、相辅相成”的原则。而为落实“四大教育”,晏氏又提出要推行教育的“三大方式”,即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与家庭式教育。

### (三)“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

通过“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解决农民的愚、贫、弱、私“四大疾病”,培育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是定县实验的基本方针。

所谓“愚”,是指多数农民是文盲,“85%的人口既不能读也不会写”<sup>②</sup>,这就使他们无缘现代社会生活,而且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定县实验通过文艺教育来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训练他们适应现代生活的能力。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建立平民学校,用《平民千字课》帮助农民扫盲,使他们掌握最基本的文字;通过推广平民文学,使农民能应用文字,并学习现代科学知识;通过戏剧改革,送戏下乡,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所谓“贫”,是指农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不少人挣扎在生死线上下。定县实验通过生计教育来帮助农民提升生产力,解决生计困难。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引进、改良新的动植物品种,组织农民合作社、成立农村合作实验银行。所谓“弱”,是指农民普遍缺乏健康卫生知识和基本医疗条件,体质虚弱,预期寿命低。定县实验通过卫生教育提升农民的强健力。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普及卫生知识,培养卫生习惯,建立乡村保健卫生制度,推行节制生育运动。所谓“私”,是指农民普遍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缺乏公共精神和合作能力。定县实验通过公民教育来培养农民的团结心,训练农民的团结力。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推行农村自治、农村自卫,广泛建立平民读书团、平民校友会等民间组织,实施县政改革。

从教育方式来看,定县实验打破传统精英教育、贵族教育的教育方式,将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相结合。所谓学校式教育,就是采用平民学校的形式,包括建立“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和“平民大学”。所谓社会式教育,是指为从平民学校毕业的学员提供在社会中继续学习的方式。农民在平民学校毕业后进入“毕业同学会”(或平民校友会),利用“流动图书馆”、戏剧社、辩论俱乐部等多种平台继续学习;“毕业同学会”会员还可作为“表证农家”,向其他农民传授知识技能。所谓家庭式教育,是指通过家庭会将全村大多数的家庭联合起来,组织各种集会,如家长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幼童会。各种集会,学习的内容仍是四大教育。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形成家庭社会化和教育化的风气<sup>③</sup>。

## 二、关于定县实验的争论

定县实验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据统计,先后在定县工作的知识分子有600人左右,在高峰时期的1935年一年就有500余人。<sup>④</sup>根据学者的严格考证,至少有70名留学生(即通常所说的“洋博士”)长时间在定县实验区工作。<sup>⑤</sup>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空前壮举,也是我国知识分子走向民间、改造乡村的空前创举。定县实验以其瞩目的成果,成为当时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一个典范,也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虽然定县实验获得了普遍的赞誉,但对于如何评价定县实验,在当时是有明显争论的。

### (一)对于定县实验的赞誉

当时,不少国内各界知名人士参观后对定县实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文学家周作人参观定县后写道:“这回我看了之后,对于平教会很有一种敬意,觉得它有一绝大特色。以我所知,在任何别的机关都很难发现的。那就是它认识的清楚。……平教会的特色,亦是普天下所不能及的了不得处,即是知道清楚这些事情而动手去做。”<sup>⑥</sup>科学家任鸿隽教授面对否定定县实验的论调评论道:“我们以为平教会的主张最为正确。它的贡献也值得称赞。因为他的主张是要深入乡间去发现他们的问题。而它的贡献,是在这些问题中间找出解决的方法来。不管它的成绩怎样,它的效果怎样,我们以为它的方向是不错的。”<sup>⑦</sup>著名文学史学者陈衡哲

<sup>①</sup>晏阳初《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在 IIRR 国际乡村改造研讨会上的讲话》,载《晏阳初全集》(第三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97-598页。

<sup>②</sup>晏阳初《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载《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晏阳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sup>③④</sup>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178、137页。

<sup>⑤</sup>薛伟强《定县实验留学生考略》,《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sup>⑥</sup>周作人《保定定县之游》,《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一期,1935年1月1日。

<sup>⑦</sup>任鸿隽(叔永):《定县平教事业平议》,《独立评论》第73号,1933年10月,第10页。

在参观了定县之后,认为“像平教会一类的工作,确是目下救济中国的根本事业之一”<sup>①</sup>。经济学家巫宝三则指出,“平教会确确实实是在那儿干”,认为“在将来亦必发生重大影响”<sup>②</sup>。历史学家蒋廷黻认为“平教会的实在贡献,在把科学和农村连合起来”“平教会的试验找到了改造中国农村的技艺和方案。”<sup>③</sup>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官毛应章参观后写成了题为《定县平民教育考察记》的长篇报告,认为“一般之农村教育者,地仅限于一小乡村,均无普遍共通之性,且无推广全国之计划。惟河北定县所办者,乃以县为施行之单位,有普遍全国之计划。”他称赞定县实验是“救济当今中国农村之唯一的良策”<sup>④</sup>。

定县实验的成绩也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肯定。1932年12月10日,第二次内政会议在南京召开,晏阳初应邀参加。会议通过的八项决议中,至少有三项来自定县实验的经验,如“必须采取科学实验之意”“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及县政建设研究院,以为县政建设发动之枢机”;确立地方卫生制度;推行调查统计工作,使一切行政方针与兴办事业,有所依据。<sup>⑤</sup>

定县实验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1933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访问定县之后发表题为《唤醒中国的民众》的专文介绍定县经验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今天由著名的吉米·晏所领导的一群工作者,正与过去不同地,即自下而上地改造生活。这里讲的就是这个巨大实验的故事,那可能会使中国的生活彻底改变”。他称赞晏阳初足智多谋、多才多艺,“与其说他是一位进步的教育家,不如说他像一位革命的战斗员。毫不夸张地说,他所领导的运动是远比任何中国军队操练前进和后退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革命。”<sup>⑥</sup>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1935年访问定县后写道“我们走访了定县的一些村庄,那里的医疗诊所和识字班正在一点一滴地解决人类问题,而这种问题通常都是那么庞大,耗尽了人们的想象力。”<sup>⑦</sup>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安诺德(Julean Arnold)称定县平民教育实验“是文明古国的四万万人民正在发展的一项最重要而且非常具有助力的运动”<sup>⑧</sup>。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Dr. James T. Shotwell赞扬定县实验不仅注意农产的增加,尤重视使经过教育的农民养成自己担负起责任,“这一注重培养人民自己负责的基本观念,自将形成全国人民生活的永久基础”<sup>⑨</sup>。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事业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他本人也获得了多种重要荣誉。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定县实验的认可。为了弥补经费不足的局面,晏阳初多次赴国外募捐,得到了海外华人华侨、社会团体、公益组织的大力支持。<sup>⑩</sup>晏阳初长期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努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1928年6月20日,耶鲁大学授予晏阳初文学硕士荣誉学位,费力甫教授宣读的赞扬词中称“他是中国平民教育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东方的贡献可能比战后任何一人都伟大。……晏君实在是世界文化中一有效能的力量。”<sup>⑪</sup>耶鲁大学校长安其博士在致辞中也评价道“我们承认你对你自己同胞们的忠实且有划时代意义的服务,显示非常的才智和创造力,以及极不自私而又有广泛的热诚。”<sup>⑫</sup>1943年5月24日,晏阳初被美国“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全美纪念委员会表彰委员会”授予“对世界文明有杰出贡献”表扬状。表扬状中称他“是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使之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千万不识字的人民;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的辛劳果实。”<sup>⑬</sup>1945年11月19日,美国旧金山市参事会全体投票,一致通过颁给晏阳初“荣誉公民尊敬状”。“尊敬状”上写道“晏阳初是经东西方各权威人士公认的真正哲学家与人道主义者。历史将以最高地位记载晏阳初对中国的贡献。”<sup>⑭</sup>1944年至1945年间,美国雪城大学、坦普尔大学、路易斯维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校纷纷授予晏阳初荣誉博士学位,以赞许他在平民教育方面的杰出贡献。1948年4月1日,美国政府公布的《援华法案》特列“晏阳初条款”(“Jimmy Yen” Provision),规定“在援华款项总额3.38亿美元中,拨付不多于百分之十金额供给实行上述计划(即提供给中国农村复兴联

① 衡哲《定县农村中见到的平教会事业》,《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第19页。

② 巫宝三《定县主义论》,《独立评论》第96号,1934年4月15日,第11页。

③ 蒋廷黻《平教会的实在贡献》,《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5月13日。

④ 毛应章《定县平民教育考察记》南京拔提书店1933年版。

⑤⑧⑨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39、322、324、420-421页。

⑥ 埃德加·斯诺《唤醒中国的民众》,载《纽约星期日先驱论坛报》1933年12月17日。参见宋恩荣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晏阳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1-477页。

⑦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⑩ 孙诗锦《定县实验与海外捐助》,《历史教学》2006年第5期。

⑪⑫⑬⑭ 杜学元等编著《晏阳初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119、119、457页。

合委员会计划进行农村建设——笔者注) 之用”<sup>①</sup>。

## (二) 对于定县实验的质疑和批评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也有不少人对于晏阳初及其定县实验提出了质疑,甚至十分尖锐的批评。

有学者对于定县实验的个别方面予以肯定,但从总体上给予否定评价。如一些学者对于晏阳初及平教会的工作精神深表同情和赞扬,但认为其改良主义思想无法真正实现乡村的复兴。经济学家孙冶方认为,不能否认改良主义者的教育和技术意义,但“一切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不论它的实际工作是从那一方面着手,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阻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主观方面的好意,绝不能掩饰他们的工作在客观上的开倒车作用”<sup>②</sup>。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晏阳初先生对于农民的同情、“开发民力”的目标、反对“空洞的口号和标语”的工作作风等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晏先生的乡建工作是技术性的,当中国社会矛盾的死结解开了,他现在所提倡的四项工作,知识、生产、健康、组织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是开发民力所需要的技术。但是晏先生30年来实地工作的经验并没有‘觉悟’这些技术性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实施的条件,那就是没有封建传统压迫和没有外来强权欺凌的局面。”<sup>③</sup>此外,还有一些在当时比较著名的文章也是持类似的立场,如吴半农的《论“定县主义”》,千家驹的《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中国的歧路》,李紫翔的《中国农村运动之理论与实际》,孙晓村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估计》等。他们认为“愚弱贫私”只是中国社会危机的四个病象,病根在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

一段时间里,平教会与定县当地士绅关系也较为紧张,士绅阶层地位的没落引发了他们的抱怨、污蔑、制造负面社会舆论。1933年,定县士绅中突然有人大肆造谣,污蔑平教会及平校毕业同学会,要求废止县政实验,撤换县长霍六丁,对到定县参访乡村建设的人士进行反宣传。<sup>④</sup>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个别情绪化的批评者,甚至恶意中伤者,如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说“定县事业,直不啻一骗人的东西。谁从当地走就请去参观。”他还指责“考其成绩,实不过一隅之发展,何补于整个之农村?”<sup>⑤</sup>。定县籍法理学学者燕树棠更是将定县实验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有害处,认为定县民众不信任平教运动的领袖,平教会把定县固有建设冒充自己的成绩,在定县制造教党与非教党的冲突,潜伏反对势力,提高定县生活水平使定县奢侈之风日甚一日等。更有甚者,燕氏在《平教会与定县》一文中还以讽刺的口吻写道“晏先生在定县十年前以千字文识字课的小教师,现在做了河北省县政研究院的院长;就晏先生个人来说,的确是很大的成功。”<sup>⑥</sup>

还有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道路的角度对包括定县实验在内的所有乡村建设实验提出了批评。如吴景超认为中国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即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转移农村人口,提高农业技术,实现农村社会发展,进而实现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他提出“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们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我们只有一条路是活路,虽然这条活路上的困难是很多的。大家不要再在歧路上徘徊了。”<sup>⑦</sup>在吴景超看来,晏阳初等人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就是所谓的“歧路”。持“全盘西化论”观点的陈序经认为“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城市教育固是要如此,农村教育也是要如此。”<sup>⑧</sup>他反对从乡村入手救济中国,对乡村建设的前途颇感悲观,对定县实验的成绩也颇为怀疑,认为“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工作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原因不外是实际做过工作的寥寥无几,就是作了,也多是空而无用”。<sup>⑨</sup>

## 三、定县实验的历史贡献

时间是最好的评判者,将历史事件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时,往往会得出更客观的认识。站在

①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420-421页。

②孙冶方《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工作》,《中国农村》1936年第2卷第5期。

③费孝通《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载《观察》第5卷第1期,1948年8月28日,见《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页。

④宣朝庆《地方精英与农村社会重建——定县实验中的士绅与平教会冲突》,《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⑤任鸿隽《定县平教事业评议》,《独立评论》第73号,1933年10月,第10页。

⑥燕树棠《平教会与定县》,《独立评论》第74号,1933年10月,第21-22页。

⑦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独立评论》第125号,1934年3月。

⑧陈序经《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独立评论》第43号,1933年3月。

⑨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独立评论》第196号,1936年4月。

百年变迁的历史视野来看,经历了时间的冲洗,定县实验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本文尝试将其总结为:一个模式,即平民教育的定县模式;一种传统,即知识分子与乡村相结合的传统;一项制度,即乡村保健卫生制度;一种精神,即定县精神。

### (一) 平民教育的定县模式

如何改造乡村、如何教育平民,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主题。晏阳初通过定县实验建立起了一种通过平民教育进行乡村改造的模式,即定县模式。定县模式的内涵十分丰富,在笔者看来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 基本理念。第一,通过平民教育实现文化和民族自觉。晏阳初强调平民教育不是以慈悲为怀的施米施粥的贫民教育,而是培养国民元气,改进国民生活,巩固国家基础的新型教育,乡村改造是为了民族再造。第二,深入民间、以民为本的理念,即所有的工作都要从农民的基本需求出发,以农民为主体。第三,“不是救济,而是发扬”的理念。要开发农民的“脑矿”,启发教育农民,激发农民他们的潜力,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他们自发自动的精神,使他们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要包办代替。只有把平民真正改造成新民才能实现平民教育的目标。第四,整体推进的理念。晏阳初强调平民教育“不是零零碎碎,而是整个体系”“不是枝枝节节,而是统盘筹划”,四大教育要“联环配合、同时并举,方有成效”。

2. 基本方案。如前所述,通过“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解决农民的愚、贫、弱、私“四大疾病”、培育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是定县实验的基本经验。

3. 具体方法。在定县实验中,平教会还总结出诸多具体的方法,如“与平民共同生活,向平民诚心学习”,要和农民打成一片、虚心向农民学习,要化农民必先农民化;要“从他们所知开始,用他们已有来改造”,要从平民最迫切的问题入手,从他们所知道并能理解的地方开始,在人们现有的基础上来进行改造,要将复杂而高深的科学知识简单化“以表证来教学,从实干来学习”,把课堂搬到了农田,变书本教学为实干学习;“导生制”,通过学生教学生、学生领导学生、学生教导一般应该受教育者的教育方法,即传、即习、即用,既解决了师资紧缺的问题,也是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方法。

晏阳初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在他持之以恒的推动下,平民教育也成为一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运动。如1935年之后,他将定县模式推广到湖南、重庆、四川等全国多个地方,创建了衡山实验县、新都试验县,以及华西实验区等系列实验区。1949年后,他又将提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的口号,在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多个国家开展平民教育实验,将定县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他所建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至今仍然运行良好,仍在为世界平民教育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看,定县实验为世界平民教育事业贡献了中国模式、中国智慧。

### (二) 知识分子与乡村相结合的传统

晏阳初认为“在中国,历来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由于这种封建意识的影响,于是乎产生了秆多书生、书呆、书奴,养成了一个士大夫阶层。”他将那种虽有知有识,但远离劳苦大众,不了解广大人民的疾苦,更看不到人民身上的潜在力量的人;近代以来日益“西化”,与中国的劳苦大众、平民、农民、苦力没关系;以及“相售文章救国、文章建国,而看不到劳苦大众中蕴藏着无穷的伟力”的人,统统看作为是“瞎子”“民盲”。<sup>①</sup>而定县实验则是开创了历史上知识分子深入民间、与乡村相结合的传统。正如有评论这所说那样“平教会没有停留在爱国的口号上,而是冲破‘学而优则仕’‘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走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时北京的报纸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分子迁往乡村运动”<sup>②</sup>有学者评论说,“平教会的实在贡献在把科学和农村连合起来”“科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好比一个泉源。平教会开了沟渠、接上管子,把泉水引到民间去了。”<sup>③</sup>晏阳初自己也曾自豪地说“这实在是空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或世界历史上都是找不到的”。<sup>④</sup>

可以说,定县实验开创是一条强调深入民间、学以致用,将论文写作祖国大地上的学术路线,同时也是一条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鼓励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出象牙塔,踏进泥巴墙”在实践中学习的教育路线。定县实验以来,知识分子下乡参与或领导乡村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传统。一代代人循着先辈的足迹,深入乡村,

<sup>①</sup>晏阳初《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在IIRR国际乡村改造研讨会上的讲话》载《晏阳初全集》(第三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601页。

<sup>②</sup>晏阳初《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总结》载《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页。

<sup>③</sup>蒋廷黻《平教会的实在贡献》,《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5月13日。

<sup>④</sup>晏阳初《农民抗战与平教运动之溯源》载《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32页。

将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用于建设乡村的实践之中。<sup>①</sup>单就定县来说,近百年来,不断有知识分子重返定县,或接续定县实验,开展“新定县实验”<sup>②</sup>,或者开展“定县再调查”<sup>③</sup>,不断延续着定县乡村建设实验的文脉。

### (三) 乡村保健卫生制度

定县实验在解决乡村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出诸多既符合既植根于乡土实践,又具有前瞻性的制度。这些制度创新对于其后几十年的乡村发展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甚至直至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乡村保健卫生制度。

定县卫生保健制度是在定县卫生教育实验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其基本理念来源于美国公共卫生学家兰安生(John B. Grant)所倡导的预防医学和社区医疗。但定县卫生实验的主持者陈志潜并没有照搬“兰安生模式”,而是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发展出一种中国农村特色的卫生保健模式。这一模式主要强调两个目标,即医药价格与设备的“非商业化”和医疗人员训练的“在地化”。<sup>④</sup>在实践中,陈志潜探索出县区村三级保健网,即在村设立村保健员,由经过简单培训的本村村民担任,负责解决村民的普通疾病和日常的卫生防疫工作;在区设立保健所,负责实施卫生教育、治疗比较严重的疾病、施行预防注射,以及监督和统率全区的卫生工作;在县设立保健院,负责治疗较重病人、防治全县流行疫病、从事研究工作、统一管理全县的药品、训练医护人员等工作。通过三级卫生保健系统,建立起以预防为主,以最简单的临床医学技术为辅助手段,利用很小的资源投入为广大贫困农民提供可支付的医疗服务模式。

这种模式的根本在于用社会动员将有限的医疗资源最大程度地用于疾病防治,而且将疾病预防与疾病治疗、疾病防治与社会改造进行了有机结合。定县实验中的一些具体举措,与新中国建立初期实施的“两管”方针(即对饮水供应和人畜粪便加强管理)或“五改”策略(即对水井、厕所、猪圈、炉灶和环境卫生加以改造),以及新中国卫生部门制定的分片包干、巡回医疗、不脱产的卫生员或赤脚医生制度及合作医疗站遍及乡村等诸多卫生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sup>⑤</sup>这一模式对于我们今天更好推行社区医疗理念、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问题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四) 定县精神

定县实验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的。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走出象牙塔、踏进篱笆墙,举家搬迁到乡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数年如一日,没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做支撑是难以想象的。这种精神首先就是晏阳初自己所说的“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的精神,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社会”,“永远迎着困难上,向困难挑战,最终战而胜之”,是以旺盛的斗志,“时时刻刻准备应付各种困难与挑战”的精神。晏阳初晚年还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即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所向无敌、不惧怕任何困难的精神,奉献精神;也是“威开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战乱不足忧”的精神!<sup>⑥</sup>

对于定县实验的领导者晏阳初来说,“定县精神”还意味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创造者的气魄和宗教家的精神。他认为,过去我们中国人有“遇事马虎”、只注意皮毛、不重视深刻了解的缺点,“要我们的民族能生存在这样科学的世界里,我们就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中国人最爱享现成的福,自己却缺乏创造的精神,墨守成规,不求进步”,因此,要培养青年学生的创造精神,以“创造国家民族的新生命”;“我们做一件事,必须要有相当的忍耐力,钉子愈碰得多,愈不要灰心,在中途不变节,只要有坚忍力,总会成功的。”<sup>⑦</sup>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晏阳初“怀着深沉的爱国热忱,以宗教家的执着精神,献身于中国与世界的平民教育及乡村改造事业。为世界范围内解决贫困地区人们的生存问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一种具有启迪意义的模式!”<sup>⑧</sup>

(责任编辑:陆影)

① 贾丽君《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9期。

② 白红义《“定县实验”新登场》,《小康》2004年第9期。

③ 黄家亮《“定县再调查”与农村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④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⑤ 景军《现代预防医学在乡土中国的实践源头和本土化过程:定县实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7期。

⑥ 晏阳初《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在IIRR国际乡村改造研讨会上的讲话》,载《晏阳初全集(第三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

⑦ 晏阳初、(美)赛珍珠《告语人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⑧ 宋恩荣《走向民间的学人——晏阳初传》,载宋恩荣编著《晏阳初及其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日本浓山渔村文化协会2000年版。